

《元和姓纂》杜氏郡望史料刍议

王力平

林宝《元和姓纂》(以下简称《姓纂》),是目前存世的惟一以姓、望、房三级结构条贯姓氏、家族以及人物的唐代官修谱牒。晚近以来,敦煌文书谱牒资料如国家图书馆藏位字79号氏族谱残卷、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》残卷等相继发现,为唐代谱牒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,但这类文献只记载了当时“姓望”在各个地区的分布和排序,没有涉及“姓望”之下的房支和人物,与《姓纂》的形式、内容都迥然有别,因而无法取代后者所具有的独特价值。不过《姓纂》“至宋已颇散佚”,至清更是“绝无善本,仅存七八”^①。清人孙星衍、洪莹以及近人罗振玉在辑佚、校勘方面用力甚勤,对《姓纂》宗旨亦有所涉及。^②岑仲勉氏参核历代史传并征引出土碑志,作《元和姓纂四校记》,在《姓纂》纂修缘起、卷数、体裁、世系叙次特点等方面均有深入阐发,堪称此项研究之集大成者。此后王仲荦先生作《元和姓纂四校记书后》,对岑氏所“未详及者”又有所补益。^③本文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结合今本《姓纂》中“占篇幅稍多、幸得不坠”之杜氏郡望史料,^④试从一个侧面揭示《姓纂》的特点及其史料价值。

一、《姓纂》记杜氏郡望周详、准确

以姓、望、房结构条贯姓氏、家族、人物,对姓氏渊源、支

系流变以及在房望兴衰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均予记述，是《元和姓纂》的一大特点。以杜氏为例。杜乃汉魏大姓，宗族历史源远流长，支系众多。然而关于杜“姓”之下究竟包含了多少郡望，谱系文献中的记载歧异甚多，如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新表》）记杜氏京兆、襄阳、濮阳、洹水4望；邓名世《古今姓氏书辩证》略同于《新表》^⑤。陈彭年《广韵》记杜氏京兆、濮阳、襄阳3望。^⑥马永卿《懒真子》引《杜氏家谱》称杜氏凡京兆、杜陵、襄阳、洹水、濮阳5“房”（此处“房”“望”同义）。^⑦在《姓纂》中，林宝条列杜氏共14望，即京兆、襄阳、中山、濮阳、洹水、陕郡、安德、扶风郡县、郾师、成都、河东、齐郡、醴泉、河南，是目前所见文献中记载杜氏郡望数量最多、分布地域最广者，为了解汉魏以至隋唐杜氏家族之繁衍分化提供了宝贵的线索，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无疑是相当高的。

除去郡望数量多之外，《姓纂》对郡望的记载大多脉络清晰，详赡可信，与史传基本吻合。比如，关于陕郡杜氏，其他谱系资料阙如，惟《姓纂》有记载：

后魏广武太守杜德，云当阳侯之后。曾孙贲阤，生善贤、善意。善贤，绵州刺史。善意，涪州刺史。

杜德事迹，见于《魏书》21《献文六王上·咸阳王禧》、《魏书》80《樊子鹄传》及《北史》19《文成五王·咸阳王禧附子树》：北魏太昌初，宗正卿元树奔梁，数为梁将领，侵扰魏境。魏孝武诏徐州刺史、大都督杜德出击，德擒树送京师。杜德为广武太守或在此前后。杜善贤则见于《太平广记》254所引《启颜录》，为长安令。《全唐诗》有刘行敏《嘲李叔慎贺兰僧伽杜善贤》。^⑧又据《新唐书》83《诸帝公主》，杜善贤同僚贺兰僧伽尚李渊女房陵公主，据此可知杜善贤为唐初人物。总之，《姓纂》记陕郡望虽寥寥数语，但其中所记人物年代却都能在史传中找到依据。

又如关于杜氏襄阳望的归属问题，有关文献也存在很大分歧：

《新表》以玄宗名臣杜希望、德宗宰相杜佑父子一支为襄阳望，《姓纂》则以杜佑为京兆望，以诗人杜审言、杜甫祖孙一支为襄阳望。那么，两者究竟孰是孰非呢？

考诸史传，杜佑出自杜预次子杜尹之后。永嘉乱时，杜尹为西晋弘农太守，因率部伍退守洛阳一泉坞，为乱兵所害。^⑩南北朝时期，杜尹子孙淹留北土，尹六代孙杜颢，有名于史传。^⑪至唐初，颢裔孙行敏名闻一时，是为杜佑曾祖；行敏生崇慤，为杜佑祖父；崇慤生希望，玄宗时陇右节度使，希望生佑。自杜颢开始，这一支子孙即以京兆之少陵为家族墓地，世世代代归葬少陵。^⑫总之，杜尹后人并无属籍襄阳的历史。而在唐代文献中，如权德舆所作杜佑遗爱碑及墓志铭，均称杜佑出自京兆杜陵；^⑬杜佑孙杜牧以及武宗朝作过宰相的杜悰，都自称“杜陵”人或被称作“京兆”人，而绝无以其为襄阳望者。可见《新表》将杜佑归属襄阳望显然是缺少史实依据的。

反观《姓纂》所记，襄阳望出自杜预少子杜耽。西晋永嘉之乱后，杜耽后裔曾流寓河西，又随宋武帝刘裕南渡，其后子孙繁衍滋盛，形成了庞大的襄阳杜氏宗族，包括宋边将杜骥、杜坦兄弟房支，梁地方豪强杜怀珪房支以及杜甫先祖杜叔毗房支，他们均与襄阳有过特殊因缘，因此在唐代人士心目中，真正的襄阳杜氏是杜审言、杜甫一支。^⑭

至于《新表》缘何致误，恐怕与杜佑父祖曾受封襄阳县男、襄阳公有关^⑮。又因《新唐书》只取宰相房望入《世系表》，而杜审言等家族未曾出过宰相，故《新表》一方面没有收录杜审言、杜甫一系，另一方面又将杜希望的封爵等同于郡望，遂误以京兆为襄阳。

总之，相对而言，《姓纂》对杜氏房望关系的记载较为全面、准确，且大多与史传记载相吻合，清人洪莹称《姓纂》“载列唐人世系，元元本本，尤为详核”，^⑯可谓确论。其实不惟杜氏一姓，他

如郑氏荥阳望之下的房支，也有类似的情况。据《新表》“郑氏”条：

（郑）晔生中书博士茂，一名小白，七子：白麟、胤伯、叔夜、洞林、归藏、连山、幼麟，因号七房郑氏。

但《元和姓纂》九“郑氏荥阳开封”云：

……（郑）晔号北祖，恬号中祖，兰号南祖。晔七子，白麟、小白、叔夜、洞林、归藏、连山、幼麟，因号七房郑氏。据《金石录》21后魏《郑胤伯碑》及荥阳后裔郑樵的考证，^⑮白麟为小白兄，胤伯为小白子，可见《姓纂》所记与史传吻合，而《新表》却有明显纰缪，难怪招致郑樵的讥讽。^⑯《新表》与《姓纂》在襄阳杜氏、荥阳郑氏记载上的歧异也说明，岑仲勉氏“《新表》乃《姓纂》之嫡子”的结论，恐怕不具普遍性，至少具体到杜氏、郑氏的郡望，《新唐书》与《姓纂》就很不相同。

二、《姓纂》杜氏郡望史料的价值

众所周知，宪宗朝编修《姓纂》的直接原因，是元和七年朝廷加封边将爵位，有司误将出自天水望的朔方帅阎某“建苴茅之邑于太原列郡”，阎对“封乖本郡”大为不满，于是上书陈述原委。宪宗痛感“有司之误不可再也”，遂诏“通儒硕士辨卿大夫之族姓者，综修《姓纂》”，使“条其原系，考其郡望”。^⑰由引可见，在唐后期，官方对郡望之别已不甚了了，以致专司此职的人员张冠李戴，误将天水作太原。足见《姓纂》的修纂，在当时是一项相当紧迫的任务。

那么，郡望之别为什么会如此混乱呢？唐自中叶以后，郡姓的变动呈现出两大特点，一是郡姓数量有大的增加，二是同姓之下郡望的界限趋于模糊。据国家图书馆藏位字79号敦煌文书氏族谱残卷、伦敦大英博物馆藏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》残卷的不完全统计，唐安史之乱前，全国85郡中共有398个郡姓；到德宗以

后，郡姓数量则成倍增加，在全国 91 郡中，已有 777 个郡姓。其中除去部分魏晋旧望得以保留外，还包括许多新兴的庶族官僚姓望，以及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姓望。再有，在科举制日益发展和完善以后，士族子弟主要通过科举途径进入仕途，他们纷纷脱离原籍，荟萃两京，而这种士族大迁徙的高峰，出现在高宗、武后及玄宗时期。^⑩伴随着士族的重新流动，唐初山东士族那种“每姓第其房望，虽一姓中，高下悬隔”的情况已有所改变^⑪，士族的地域意识逐渐淡化，同一姓氏内部的房望高下之分实际上已不那么分明。

仍以杜氏家族为例。从唐初开始，杜氏襄阳、洹水、濮阳等郡望也相继迁往两京，其著名人物大都跻身于显宦行列。在玄宗天宝时期，杜氏尚且分为京兆、襄阳、濮阳三望。^⑫但在德、宪后的谱牒文书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》中，杜氏仅见于“雍州京兆郡出卅姓”下^⑬，而濮阳、襄阳、洹水、中山等望已不见记载。另在反映代宗大历后郡姓分布情况的《太平寰宇记》中，杜氏也只出现在“关内道雍州京兆郡八姓”中。^⑭杜氏郡望渐趋划一的过程，开始于唐代中叶，即《新唐书·高俭传赞》所云：“至中叶，风教又薄，谱录都废，公靡常产之拘，士亡旧德之传。言李悉出陇西，言刘悉出彭城。悠悠世祚，讫无考按。冠冕皂隶，混为一区。”在此背景下，《姓纂》记载了汉魏以来大姓之下的众多郡望，及时描摹下了一幅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了的中古士族郡望房支全图，不啻“抢救”出了一笔财富，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

清人孙星衍说：“姓氏与郡望相属，乃知宗派所出”，^⑮扼要概括出郡望与宗族的关系。在中古士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，郡姓下的房支是士族家族研究的核心内容，离开房支这一基本环节谈论士族只能流于空泛。《姓纂》中的杜氏郡望、房支史料，对于深入探讨杜氏家族的发展历史，具有重要价值，这主要体现在：

首先，杜氏 14 望清晰勾画出了杜氏本宗和支系的发展脉络。

杜氏先祖原籍本在南阳杜衍。先是杜周一房于汉武帝初年迁至茂陵，至杜延年时又迁居杜陵。经过大约三代人的经营，“杜陵杜氏”（亦即日后的京兆杜氏）成为远近闻名的世家。到魏晋之际，以杜畿、杜恕、杜预为中心，杜氏家族更加繁盛，成为四海望姓。西晋永嘉之乱，杜姓分化为南北两个系统，十余个郡望，而洹水、中山、襄阳等郡望大都是此时由京兆本宗分化出来的房支，以后逐渐发展为独立的郡望。但在正史中，很难找到这些房望关系转换的记载。因此，根据《姓纂》所提供的郡望史料按图索骥，往往会在探寻姓氏流变方面有大的收获。

其次，从地理分布上看，《姓纂》杜氏 14 望散处关中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以及江汉、蜀川等地。这个现象表明，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，杜氏房望关系变动剧烈，杜氏后裔遍布四方，如杜预四子中杜锡后人南渡建康；杜耽一支南渡襄阳，成为侨姓士族中的一员，在南朝政治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，渐渐独立为襄阳望。他们的活动和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“关中”的范围。可见《姓纂》保留下来的郡望史料，极大丰富了杜氏研究的时空内涵，为探求汉唐数百年间杜氏家族的兴衰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线索。正如岑仲勉氏所说：“有能继轨六朝，网罗百姓，书虽残缺，大致犹具者，于今唯唐林宝之《元和姓纂》，岿然尚存，非氏族学者所亟宜攻治之书乎！”可见，《姓纂》中有关郡望的史料，在今日仍不乏其珍贵的价值，对此，学者应予以高度的重视。

注：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135 子部类书类一，中华书局 1965 年。

②孙星衍、洪莹整理的“录本”于嘉庆七年刊行。后又有洪莹的金陵书局“局本”于光绪六年刊行。罗振玉就局本作《校勘记》二卷。

③《嵇华山馆丛稿》，中华书局 1987 年。

④岑仲勉《元和姓纂四校记自序》云：“若今本韦、杜、刘、陆诸姓，占

篇幅稍多，幸得不坠者，或因与传录人有关，未可定矣。”见中华书局1994年版《元和姓纂》。

⑤见该书卷24，中华书局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

⑥此杜氏三望见于宋陈彭年《广韵》卷3“十姥·杜姓”。

⑦中华书局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。

⑧《全唐诗》869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。

⑨《晋书》63《魏浚传》。

⑩《魏书》45《杜铨传附杜颙》。

⑪《樊川文集》卷10《自撰墓志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。

⑫《全唐文》卷496权德舆《杜佑遗爱碑》，卷505《杜佑墓志铭》。

⑬如宋之问在与杜审言的送别诗《三月三日于灊水曲饯豫州杜长史别昆季序》中称：“言辞灊灊，将适荆河。恋旧乡之乔木，藉故园之芳草。”显然是把“荆河”看作杜审言的“故园”的；又如高宗时杜易简与吏部侍郎李敬玄失和，李称易简为“襄阳儿”。杜怀宝后裔杜文瑜也被时人称作“襄阳人”。

⑭《全唐文》卷496权德舆《杜佑遗爱碑》。

⑮洪莹：《校补元和姓纂辑本后序》，见中华书局1994年版《元和姓纂》。

⑯郑樵：《荜阳谱序》，载清咸丰十一年刻印《樵月斋郑氏宗谱》。

⑰郑樵：《荜阳谱序》云：“今《唐书》但取其宰相世系而录之，且既曰世系，则其亡所系当概举，岂可偏录。如三代时国家相传，贵贱有定分，故取其世适。三代之法既远，不过于众姓之中，骤贵者则为宰相，又何必黜彼而取此？”（出处同上）

⑱林宝：《元和姓纂原序》，见中华书局1994年版《元和姓纂》。

⑲据毛汉光对清河崔氏、博陵崔氏、范阳卢氏、陇西李氏、赵郡李氏、太原王氏等10姓、13家所作的统计调查，自隋初迄于唐末，上述大士族之主要人物从幽冀、陇西、吴会等地汇聚京、洛，他们定居两京地区，以便在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寻找仕进之机（《中国中古社会史论》第八篇《从土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土族之中央化》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88年）。

⑳《新唐书》95《高俭传》。

㉑《广韵》本出于唐天宝时人士孙愐之《唐韵》，其中有关郡望的史料基本上可视作唐代中叶郡望分布的客观记录。参考〔日〕池田温《唐代的郡望表（上）——九·十世纪的敦煌写本を中心として》，《东洋学报》1959年，

42—3号。

②王仲萃：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》，《崞华山馆丛稿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。

③王仲萃：《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》，《崞华山馆丛稿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。

④孙星衍：《校补元和姓纂辑本序》，见中华书局1994年版《元和姓纂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

（上接第73页）

③《说郛》（宛委山堂本）卷五九所录《玄晏春秋》亦作“十七年，予长七尺四寸……，母投诸地曰……今尔年近乎三十，……”“三”当为二之讹。

④见陆侃如：《中古文学系年》卷五、卷六之《皇甫湜文学系年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⑤同上引，陆侃如在《中古文学系年》中将此表作年系于泰始三年，不甚合理。

⑥指海本钱熙祚《帝王世纪·序》。

⑦纪昀：《阅微草堂笔记·滦阳消夏录》。

⑧见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杂传序引，华东师大出版社，1985年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开大学中文系